

往思錄

葛劍雄 著

目 錄

童年記憶	001
人生之初	002
故鄉小學雜憶	006
與書無緣——故鄉童年的回憶	011
初中生活憶舊	014
永遠的母校	021
通古今之變的南潯	024
童年生活中的江南「糞土」	028
青春無奈	033
我在市北的不幸與大幸	034
偶涉經典亦受益無窮	038
時代性的人性扭曲——特殊年代中的雙重人格現象	040
殉葬品和掘墓人：「文革」期間的中學教師	050
當年「樣板」	065
我所經歷的抄家	081
我經歷過的「學生政審」	090
青春無奈（二則）	099
病室憶舊	106
我記憶中的北站	109

治學問道	113
我的1978年	114
我的博士研究生經歷	123
四十年夢想	131
我與改革開放：為學四十載	133
我的人口史夢——《中國人口發展史》的自我介紹	147
復旦教授不僅敢說「我不知道」	158
雜說知識分子	160
被高估的民國學術	168
功夫在「書」外	174

書緣終身	183
我的書和書房	184
我的新書房	192
藏書的歸宿	194
未建成的施堅雅文庫	203
圖書館的難題	207
我為藏書找到了歸宿	213

生活經歷	219
我當市人大代表	220
1982年的記憶：搬家	228
我與游泳	231

我與上海	237
我的人文觀	239
財富斷想	257
會海一勺	264
覓食經驗看排隊	275
訪臺瑣記	277
安檢種種	283
雜憶乘飛機	288
《成蹊集》序	304
世紀雜感	309

往矣昔人	317
超越死亡	318
真正的學者——悼石泉先生	322
記憶中的筱蘇（史念海）先生	324
懷念侯仁之先生	328
最憶康橋風雪時	333
汪老遠行感言	337
我所知的俞大績	340
雁歸來兮尋根	342
亡友李仁一年祭——特殊年代的特殊情誼	344
《周有光百年口述》讀後	347
稽山仰止 越水長流——懷念陳橋驛先生	352
《陳橋驛學術論文選編》序（節選）	358

讀史閱世皆求真——讀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	362
憶何炳棣先生	364
人天永隔竟如斯	376
憶舊之難——並談一件往事	380
憶舊還是難	386
願閣樓裏永遠有這盞燈——讀沈昌文《閣樓人語》	390
老沈的吃局	394

萬里記蹤	397
我的非洲情（代序）	398
非洲之行看歷史	407
我到過的南極	442
尋訪李約瑟	456
邂逅霍金	466
村山富士印象	468
萬里之行 始於船上——《行萬里路》自序	471
校後記	476

童年記憶

人生之初

一個人的生命自然是從脫離母體開始的，但其記憶和記錄未必同時開始。記憶是主觀的，既取決於腦活動的成熟程度，也取決於所受到刺激的強度。在沒有錄音的條件下，自我記憶只能從識字、寫字開始。非自我的記錄則取決於客觀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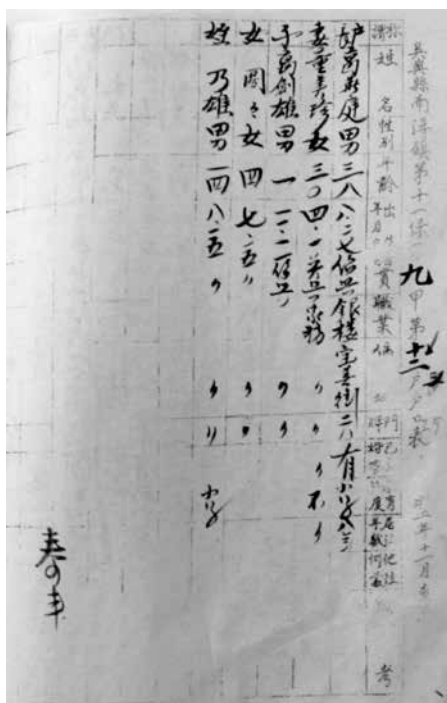
1945年12月15日（農曆十一月十一日）早上，我出生於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今屬湖州市南潯區）寶善街家中。具體時間從沒有人告訴我，我始終不了解，因為那時沒有出生證，也沒有任何其他書面記錄，家人最多記個時辰。解放後，「生辰八字」屬封建迷信，家裏沒有人再提，我自然不知道我出生在哪個時辰。

這個世界給我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我從睡夢中被驚醒，已經坐在床上的母親趕快將我抱起，說着「不要怕，不要怕」。外面天還沒有亮，屋裏點着洋燈——煤油燈。地板上睡滿了人，好像都已經起來了。兩個陌生人在說着甚麼，一會兒推開門走出去了。後來父母親告訴我，當時南潯鎮上來了很多兵，還傳來槍聲。我家的房子不臨街，建在原來一座燒毀住宅的房基上，地勢高，還有面街的圍牆。從沿街一家店舖的後門進來，要走上幾級臺階，推開牆門才能進來。所以當天就有沿街的鄰居來我家避難，晚上就在兩間房間內

「攤地鋪」過夜。父親與眾人將牆門堵死，在牆上架梯子出入。那天還沒有亮，兩個國民黨軍隊的散兵翻圍牆進來，又從窗口跳進房間。面對驚醒的眾人，他們不停地說：「老鄉，不要害怕。求你們給我兩件舊衣裳。」拿到衣服後就將軍裝換掉，然後又翻牆離開。

我請南潯的朋友查了，南潯是 1949 年 5 月 2 日解放的，那天應該是 5 月 1 日，當時我 3 歲 5 個半月。

以後的印象更清晰，鄰居都走了，家裏又恢復原樣。過了幾天，街上傳來鼓號聲，大人牽着我到街上看熱鬧，南潯中學的學生在遊行，學生們敲着洋銅鼓，吹着號，拿着彩色標語旗，喊着口號走過。晚上有提燈會，參加的人提着各式各樣點了蠟燭的燈遊行聚會。父



葛劍雄先生一歲（1946 年）時的戶籍登記冊

親給我用紅紙在竹架上糊了一個五角星小燈，裏面還點着小蠟燭。我興高采烈地提着這盞小燈站在大街邊上，可是一陣風吹來，蠟燭火將紙燒了，提燈的繩子也斷了，只剩下一個竹架掉在地上。

前幾年南潯的陸劍兄在舊檔案中發現了我家的戶口表，拍了數字照片送給我。這是一張油印表格，用毛筆填寫的「吳興縣南潯鎮第十一保九甲十二戶戶口登記表」，註明「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查」。上面的欄目有關係、姓名、性別、年齡、出生年月日、籍貫、職業、住址、門牌、已婚未婚、教育程度、居住年數、他往何處、備考共 14 項，相當詳細。第三行就是我，填着：(關係) 子，(姓名) 葛劍雄，(性別) 男，(年齡) 一，(出生年月日) 一一、一一，(籍貫) 紹興，(地址) 寶善街，(門牌) 二八，其他各欄空白。這是迄今為止已發現的關於我的最早記錄。表上填的顯然是農曆，我出生於十一月十一日(公曆是 12 月 15 日)，正好滿一歲。

表上登記的地址是寶善街 28 號，但這不是我的家，而是父親買下的一間沿街門面房，與我家前面的店舖相隔幾個門面。父親從紹興到南潯學生意，在王寶成銀樓當學徒，滿師後留在店裏工作。日寇侵佔南潯後，老闆王士坤逃難去了上海，但店裏還有幾十兩黃金沒有帶走。父親及時妥善保管，以後又冒着生命危險，將這些黃金隱藏在一隻新馬桶裏，躲過日本兵與漢奸的一次次搜查，送到上海王士坤家。王士坤感激不盡，在父親結婚時送給他一塊「火燒白場」(被火燒毀的房屋廢墟)和北面一堵殘留的圍牆，我家的兩間住房就是在清理後的原存地基上建造的。這堵圍牆又高又厚，1980 年南潯鎮供銷社收購我家房屋時，這堵牆的估值幾乎是房價的一半。為了證實我家的產權，供銷社還專門派人到上海找王士坤核對過。王士坤還資助父親自立門戶，開了一家「銀樓」，實際只是加工金銀首飾的小作坊，老闆和夥計就是父親一人，開在寶善街 28

號。表左側寫的「泰豐」兩字，是店名，我幼時還在家中找到過一大疊印有「泰豐銀樓」廣告的包裝紙。

表上的內容還糾正了我家一個一直存在的錯誤。表上第五欄記着：侄，乃雄，男，一四歲，八、一五出生，籍貫紹興，教育程度小學。他是父親的堂侄，家裏託父親帶他出來學生意，年紀還小，就住在我家，做些雜活和家務。解放後浙江省禁止私人經營、加工金銀首飾，父親關門失業，他則回了紹興老家。父母親一直叫他 Nan Yu，大概因為他們的文化程度有限，讓我將他的名字寫為「南育」，並且誤以為葛家我們這一輩是「南」字輩，現在才知道應該是「乃」字輩。

表上還有些不該有的錯誤，說明當事人的粗疏低效。父母親的年齡都錯了：父親出生於 1912 年，1946 年應該是 34 歲。即使用虛歲，最多寫成 36 歲。母親出生於 1921 年，1946 年應該是 25 歲，虛歲至多寫成 27 歲。父親沒有正規上過學，母親倒是在南潯鎮上過小學，表上卻被填為「不（識）」。至於我的姓名排在年長我三歲的姐姐的前面，而她排在我後面並只填名字，無疑也反映了當時重男輕女的慣例。

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着比較完整的解放前的戶籍卡，「文革」期間「清理階級隊伍」，我作為學校「專案組」成員，憑「閘北區革命委員會」的介紹信去查過。想不到南潯鎮也保存着這些檔案，並且被陸劍兄發現，使我有了人生最早的記錄。

現在國內有些高齡紀錄得不到國際機構的承認，原因是找不到原始的出生證或可靠的出生記錄。如果我今後有幸創下高齡紀錄，這一頁戶口登記就是可靠的出生記錄。

本文寫作於 2023 年 10 月。

故鄉小學雜憶

兩年前，吉林電視臺拍攝《回鄉》系列，將我也列入其中，於是攝製組隨我回到我的出生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潯鎮。當天下午，我來到曾經就讀的小學，原地幾乎已經無法辨認。從一條巷子繞到背後，終於找到了一排似曾相識的舊平房，現已闢為民居。據住戶中一位老者說，這就是當年小學的教室。我入學時，學校名為圓通小學，後改名潯北小學，那時的南潯鎮屬吳興縣。

我上學的時間很早——1950年9月，年齡四歲零九個月。據說是因為年長我三歲的姐姐上學，我跟着去玩，到校後就不肯回家，一定要上課。老師就讓我坐到一年級教室裏，與新生一起上課，見我很認真，就同意了。學校是利用圓通庵改建的，以後學了歷史，才知道這圓通庵曾經發生過驚天動地的大事。清初南潯莊氏私修《明史》案導致七十多人被殺，這惹禍的《明史》就是在圓通庵修的。但當時我只知道校舍的門檻很高，我跨不過去，每次都要大同學或老師幫助。由於年齡小，個子也小，兩年後才正式升級。

學校很小，設施簡陋，但也有禮堂和操場。因為我從小不喜歡運動，所以對操場已經沒有甚麼印象。那禮堂大概是原來的佛堂，已經改建，搭了一個臺。大概三年級時，班主任韓學農老師為我排

練一段快板，參加全校的演出。快板的內容是老農民擁護糧食統購統銷。他親自將我化妝成老頭，穿上一條「作裙」，挑着一擔「糧」。我一走上臺就引來全場關注，誰知剛開始說話，扁擔一頭的繩子斷了，韓老師不得不上臺救火。

另一次是全校的演講比賽，也是上臺講。這次我還獲了獎，獎品是一本「千用簿」。其實就是在一塊蠟板上鋪了一張半透明的薄紙，用不太尖的竹筆在上面寫字畫線，可在紙上見到痕跡。而將紙提離蠟板後，上面痕跡即消除。如此可反覆使用，節約對我來說很貴重的紙筆。實際上用不多久紙就破了，但當時的確讓我既興奮又榮耀，也引起同學們的羨慕。

雖然是在小學，頻繁的政治運動也已是我們的重要內容。特別是在這樣的鎮上，任何運動都是全民動員，我家門前的寶善街和附近的大街上裝的廣播喇叭不是宣傳就是演唱，幾乎每天都會給我增加新的記憶。例如有段時間，不斷播放越劇演員袁雪芬唱的歌頌新婚姻法的曲子，以至到今天我還記得「千年枷鎖已打碎，封建禮教如山倒」等內容。斯大林葬禮那天，我們正在空地上看人放風箏。忽聽到喇叭裏傳來汽笛聲，周圍人肅立，我們也趕快站好。只見一隻風箏脫線飛走，放的人也不敢去追。等肅立完畢，風箏早已不見蹤影，大家連叫可惜。

有一段時間，鎮上到處在開會學習，不知是哪次運動。連作為家庭主婦的母親也天天晚上去學習，地點在原來的耶穌堂。參加學習的都是婦女，不少人帶着孩子，一起在門外或過道裏玩得很開心。有時媽媽們唱起歌來，我們都擠在門前窗口看，覺得很新鮮，所以巴不得母親天天晚上帶我們去開會。

鎮壓反革命運動時又是另一種景象。除了喇叭裏天天不斷宣傳、喊口號外，深更半夜也會有人在街頭巷裏巡邏，邊敲鑼邊喊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時聽大人說，某家某人被抓，「解湖州」（押送縣城）了。最可怕的還是聽同學描述槍斃人，說親眼看到腦袋開花，白色的腦漿與血一起流出來，有的還說槍打過後頭被削掉一半，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同學嚇得晚上做噩夢。雖然槍斃人的地方離我們家並不遠，但大人不許我們去看，我也從來不敢去。

另一些運動就連小學也參加了，並且都很積極，比如歡迎志願軍傷病員、各種遊行，特別是愛國衛生運動。記得在抗美援朝時，聽說美帝發動細菌戰，例如在附近某地扔下了細菌彈，有致鼠疫、傷寒等的細菌，還放在糖果中引誘孩子去撿。老師教育我們路上的東西不能隨便撿，發現可疑要立即報告。這使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看到老鼠就想到鼠疫，害怕被傳染。

南潯鎮被評為愛國衛生先進鎮，其中少不了小學生的功勞。有一位名叫王阿金的老太作為代表去北京開會，見到了毛主席，南潯作為衛生鎮的名氣也更響了。衛生鎮的標準之一是無蠅，於是就得不斷滅蠅，小學生成為主力，每個人都有任務，必須消滅多少個蒼蠅。下課後，我們就帶上自己做的蒼蠅拍和盛着散石灰的空火柴盒出發了。我們的蠅拍是用廢紙板剪成長方形或橢圓形，上面打些孔，中間插一根竹柄。這樣的蠅拍打起蒼蠅來比較費勁，容易破，而且用力太猛了會把蒼蠅打扁打爛，看了噁心，還不便統計數字。但商店裏賣的紗面蠅拍我們是買不起的，雖然用起來很方便。因為要完成任務，且最好要超額，所以我們專找蒼蠅多的地方，如「羊木行」（製革作坊）。那一張張被釘在木板上的新鮮羊皮，表面還能看到血絲，會引來大量蒼蠅，正是我們擴大戰果的好機會。上交死蒼蠅時要統計數字，開始時一個個數，後來改為稱份量，以兩為單位。我大概沒有甚麼突出表現，所以沒有像演講比賽那樣得獎。

與運動配合的還有歌曲，學校裏教，更多的還是喇叭裏播放，

遊行時唱。所以我不僅會唱少年兒童唱的，如《讓我們蕩起雙槳》等，還會唱中學生和成年人唱的歌，也會唱流行的蘇聯歌曲。記得有一次看遊行，見隊伍中有人扛着一棵連根拔起的柳樹，喇叭裏播的是：「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啦，天空出太陽呀，地上開紅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敗了美國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要把帝國主義連根拔那個連根拔！」這樣的歌至今我還能記得，足見當初印象之深。

大多數同學家裏都很窮，但我家更窮。新中國成立前，父親是「銀匠」，在寶善街一間街面房為人加工金銀首飾。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浙江省取締這一行業，父親就此失業，一家五口只能靠借貸和變賣度日。先賣家中存下的零星首飾，再賣銅錫用具。由於浙江省停止收購金銀首飾和銅錫器，又禁止將其帶出省，父親都是天不亮就出門，偷偷送到鄰近的江蘇省去賣。坐吃山空，何況家裏根本沒有山。他曾與兩人合夥開過一家小文具店，沒有多久就關了門。幾年後他去上海謀生，但經常沒有錢帶回家來。直到 1955 年他掌握了土法製造鑽頭的技術，於是讓母親也去上海擺攤推銷，生活漸趨安定。為了省錢，家裏經常買最便宜的黑麵粉，吃菜粥。但最難對付的還是開學時交學費、書簿費，姐弟三人上學，經常連書簿費也交不起。開學時，看到其他同學領了新書，自己則一直在擔心，不知哪天會被老師趕出教室，好在老師總是雷聲大雨點小，說話總不算數，一再寬限。有一次，開學已經幾天，我已嚇得不想上學，舅父得知後送來了救急的錢。

到讀完五年級，我從來沒有買過一本書。但我從小喜歡看書，只要有字的紙都會拿着看。無論是糊牆的「申報紙」（當地當時對舊報紙的通稱），還是偶然得到的一本舊書、一張字紙，我都會看，無論懂與不懂。有一次舅父從他就讀的平湖師範回來，帶給我們幾

本連環畫報，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五年級時姐姐進了初中，她的課本成了我的讀物。只要她在家，我就從她書包裏翻書看，特別是文學課本，我從第一課《論語》選讀的「學而時習之」起，差不多每篇都背得出。只是好多字都唸錯，更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除了5歲時隨父親回過一次原籍紹興外，我一直沒有離開過南潯鎮。最遠的一次是學校組織「遠足」（春遊）去了十幾里路外的江蘇震澤鎮。另一次「遠足」是去沈莊漾「露營」，晚上在古墳臺上搭帳篷睡。四年級時我參加的一個集體節目被挑選到縣裏演出，要乘輪船去幾十里外的菱湖鎮，但自己要付幾毛錢買船票，我只能眼睜睜看着被別人替補。1957年，父母在上海安頓下來，那年暑假讓我轉到上海讀書。當輪船在夜色中駛離碼頭，我整夜未曾入睡，想像大上海的景象，直到江上的大輪船、江邊的廠房和煙囪出現在晨光中。

開學後，我成為上海閘北區虬江路第一小學六年級學生，到今天已過半個世紀。但故鄉的小學生活不時會浮現在眼前，當年的艱難苦澀都已淡去，留下的只是難忘的記憶。

原載蔣保華主編：《小學學甚麼——精英是這樣煉成的》，教育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與書無緣

——故鄉童年的回憶

1945年12月15日，我出生在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今屬湖州市南潯區）。儘管這個江南名鎮以藏書數十萬卷的劉氏嘉業堂聞名，又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條蛟黃狗」（不同等級的豪富）稱雄，但我的家庭卻與書籍和財富無緣。

我的父親出生在浙江紹興農村，十幾歲背井離鄉到南潯當銀樓學徒，以後自己開一家小店加工金銀首飾，唯一的學徒兼幫工就是從家鄉來的一位堂侄。我的母親出生在安徽徽州，外祖父從徽州到南潯米店當學徒，滿師後當店員，以後自己開了一家小米店，才將家屬接到南潯。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祖父母和父親一輩的其他親人都已去世，在南潯鎮上只有母親一方面的親戚，也只有我的舅父一家。父親讀過兩年書，識字不多，字也寫得不好，卻有一手絕技，能在首飾上鑲刻工整的楷書，如在「名字戒」上刻上一對新人的姓名。南潯鎮得風氣之先，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有女校，母親也得以讀完初小。文化程度最高的是我的舅父，在新中國成立前讀了初中。所以到上學前，我從來沒有在家裏看過甚麼書，能夠玩的是「假鈔票」（貶值或作廢的舊幣）和印着不同圖畫的「香煙牌子」。父

親有一位堂姐是信教的，在我家住過一段時間，留下了一部《馬太福音》。我當時不知道是甚麼東西，只覺得裏面的紙很光滑，就悄悄撕幾張下來摺成紙蝙蝠玩。

1950年秋季開學，我還不滿5歲，跟着剛上學的大孩子到附近的圓通小學去玩，一去就不肯回家，一定要隨他們進教室上課。那時沒有甚麼入學的年齡規定，教師看我坐着很認真的樣子，就答應讓我上學了。唯一的麻煩是，由圓通庵改成的校舍有幾個門檻很高，我需要由別人幫助才能跨過去。以後學了歷史，才知道這圓通庵就是當年莊廷鑑的父親為他刻《明史》的地方。

就在我剛剛跨入校門不久，當地政府禁止私人經營和加工金銀首飾，父親一下子喪失了謀生的手段。浙江省還停止收購金銀首飾和銅錫器，家中剩下的一點首飾無法變成現錢，生活立時陷入困境。後來打聽到江蘇省還在收購，父親經常在天不亮時就帶上家裏的銅錫器或首飾，趕到鄰近的屬於江蘇省的小鎮去，變賣一些錢來維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同時他還千方百計找活幹。但這個商業市鎮已有大批商店關門歇業，失業的人很多。為了省錢，家裏連最便宜的米也捨不得買，而是買更廉價的整包黑麵粉，每天自己加工麵食。

每當開學時，我們就要擔心父母還有沒有交書學費的錢，要是沒有，學校還能不能讓我上課。有一次，直到正式上課的那天早上，舅父才替我交了學費。在這樣的條件下，我自然不敢再有買書的奢望。直到讀完小學五年級離開南潯，我從來沒有買過一本課本以外的書籍。有一次在平湖師範讀書的舅父給我們帶來了幾本連環畫冊，就成了我反覆看的課外讀物。讀五年級時，姐姐進了初中。當時初中語文分成文學和漢語兩課，文學課本中選了很多古典詩文。我飢不擇食，就把她的文學課本當成我看的書，居然將裏面的詩文都背了出來。後來知道很多字的音都是唸錯的，意思就更明白了。

如果我不離開南潯鎮，或許還只能繼續那樣看書。但到 1957 年我轉學至上海，與書無緣的日子終於結束了。

以後我學了歷史，特別是研究了歷史地理以後，對南潯鎮的過去越來越了解，童年的記憶也由苦澀而變得溫馨，因為當時所見所聞而今早已煙消雲散，或物是人非，或人、物兩亡了。國內外的同人知道我生長在南潯，皆稱羨不已，或以為我有甚麼家學淵源，或拔高為「人傑地靈」，我卻至今想不出一個所以然，還是老老實實寫下這段經歷。

本文寫作於 2001 年 7 月。

初中生活憶舊

1956年暑假，我從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今屬湖州市南潯區）潯北小學五年級轉學來上海，此前我父母先後到上海謀生，依靠從事個體勞動所得已有條件供養我在上海上學了。我家租住的房在閘北區，我到區教育局辦轉學手續。看了轉學證書，教育局的辦事人說要考試，成績合格才能接受。幾天後接到通知，我已被轉入離家不遠的虬江路第一小學，升入六年級。這所小學的本部是虬江路上一片老舊平房，六年級兩個班在分部上課，是一所被接管的私立小學，就是弄堂裏一所三層樓民居，除簡陋狹小的教室外，沒有任何活動場所，體育課和廣播操只能利用這條弄堂。幸而馬路對面有一個免費開放的交通公園，成為我們課餘的活動場所。

第二年小學畢業，那時上海小升初可以自由報考學校。我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加上來上海時間不長，該報哪所中學完全沒有主意，由我自己選擇。我想起不久前經過長安路時見到一幢嶄新的三層大樓，聽說是新設的長安中學。志願表上果然有此校名，我毫不猶豫地報了，並如願被錄取。以後與同班同學談起，發現好幾位的報考原因和我一樣，被這座新樓所吸引。入學後才知道，長安中學前一年就開始招生，第一屆學生是借用十三中學（後改名共和中學）

校舍上課的，所以我們是第二屆，進校時已經有了初二年級。十三中學出了乒乓球國手李富榮，初二同學也引為自豪。校舍是新的，課桌椅、教具都是新的，寬敞明亮的教室與弄堂小學的民房簡直有天壤之別。在馬路對面還有一個運動場，每年的運動會也不必另找場地。很多老師也是新的，很年輕，如我們的班主任崔老師就剛從大學畢業。

從江南小鎮到了上海，我像進入了一個新天地。從小學進入中學，又進入了一個更廣闊的天地。

領到貼着照片的學生證（小學生是沒有的），我最感到高興的是從此可以進上海圖書館了。不久的一個星期天，我就憑這張學生證走進了這座嚮往已久的大樓，在閱覽室讀到了以前只知書名的書。在那裏，我第一次翻着《唐詩三百首》讀唐詩；第一次拿到《古文觀止》讀《滕王閣序》全文，找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出處。我借《三國志》時，拿到索書單的工作人員問：「小朋友，你是要《三國演義》吧！」我回答：「沒錯，我要《三國志》。」為了怕他再問，又補充：「我要看歷史書，不是要看小說。」

我從小喜歡畫畫，因為沒有人教，又沒有錢買圖畫紙和顏料，只能利用廢紙或課本、作業本的空白處亂塗。那時新出了不少連環畫，學校附近正好有一些「小書攤」，可以一分錢一本的代價坐在那裏看，也可以花兩分錢租一本回家看。我沒有甚麼零花錢，只能偶爾坐着看一本，倒是從租書回家看的同學那裏借看的更多。我對《三國演義》等連環畫中的古代人物、戰爭場面很有興趣，經常模仿着畫，一度連上課時都在偷偷畫，得意的作品還傳給其他同學看，居然一次也沒有被老師發現。或許老師看在眼裏，只是不願打斷正常的講課。小書攤上的書以舊小說為主。初二下學期我在街道食堂吃中飯，省下些伙食費，盡其所能租了看，為了省錢，一本書都是當天看

完，《三俠五義》《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都是那時看的。

教室後面牆上是兩塊大黑板，由班委負責出黑板報。班長見我愛畫畫，就要我一起出。我們從學校領到一種「六角粉筆」，比普通圓粉筆品種多，色彩鮮豔，很適合在黑板上作畫或美化版面，我得以大顯身手。後來我又學了用濕抹布打樣，寫空心美術字作標題，將黑板報佈置得很漂亮。有時稿子不夠，我就臨時寫幾句詩填補空缺。一次全校黑板報評比，我盡了最大努力，老師同學都說好。評比那天，一位老師看後卻提了意見：「出得很好，可惜這首詩是抄來的，否則就可以評一等獎了。」我連忙說：「不是抄來的，是我寫的。」這首詩是歌頌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開始兩句是：「這是甚麼聲音？驚醒了宇宙的寂靜。」老師不相信，指着「宇宙」兩字問我是甚麼意思，我作了一番解釋，又背誦一遍，使他確信我是作者。結果我們班的黑板報被評為全校一等獎，我被少先隊大隊部聘為宣傳幹事，為大隊出黑板報，還經常有機會參加大隊幹部的活動。學校組織教師參觀新建的「閔行一條街」，我作為大隊幹部的擴大對象也參加了。在汽車上與老師們同席而坐，中午在閔行老街上一家餐館與老師們同桌吃飯，認識了任課教師以外的老師。語文教師趙僅一見我書包中帶着一本《楚辭選》，驚奇地問我是否看得懂，我告訴他通過註釋大致看懂了，帶在身邊是為了有空時隨時可以背誦。如果借不到書，我就將要背的古文詩詞抄在紙上，帶在身邊隨時背，《蜀道難》《夢回天姥吟留別》《滕王閣序》等就是這樣背出來的。他聽了很高興，說以後要借甚麼書，他可以幫我從圖書館直接借。其實此前歷史教師王應麟已在幫我借書，有了趙老師的幫助就更方便了。

我的數學成績也不錯，但算不上突出。初三時學校選拔參加市、區數學競賽，我被選上了。於是臨時抱佛腳，集中做數學題，

居然在區競賽中勝出，獲得參加市競賽的資格。但在市競賽初試就被淘汰，從此再未參加過數學競賽。

一度我愛上了製作航模，經常到南京路的翼飛航模店去看。但我連那裏最便宜的一套航模器材也買不起，只是去開開眼界。到了初三，學校成立航模隊，我第一批報名參加，很多課餘時間都在學做航模，還經常去參觀航模比賽。在「大躍進」的鼓舞下，我們要求直接製作動力航模，學校支持，花七十多元買了一個微型汽油活塞機。我們製成了機身，安裝機器卻沒有成功，因畢業臨近，只能不了了之。

差不多同時，學校辦了無線電收發報組。電影、小說中地下工作者用秘密電臺收發報的神秘形象和神奇作用早就令人神往，有此機會自然不會放過。按規定，每人只能報一項，我已經參加了航模隊，只能跟指導教師磨到「試學」無線電收發報的資格，但不久就成了組裏的骨幹，並且屬於少數堅持到底的。指導教師是教物理的胡旭德老師，據說他以前在部隊當過電報員。他一開始就警告我們：不要以為好玩，其實很枯燥。先學收報，他用唯一的電鍵連着一個蜂鳴器發報，我們不用耳機，直接聽聲音抄報。練抄數字碼時，人坐滿了一教室，到練英語字母碼時已少了一半，隨着他發報速度的加快，人越來越少。到學發報時，學校已經沒有條件，胡老師帶我們去四川路上的青年宮，那裏有設施齊全的無線電收發報教室，每人有一個座位，配着電鍵和耳機，可以互不干擾同時練抄報和發報。我的收發報速度越練越快，胡老師說已達到三級運動員的水平。可惜學期結束時沒有等到這一項目的運動員等級考試，沒有拿到這張我唯一有可能得到的體育等級證書。

「大躍進」時，學校所在的街道增加了一些公共設施，有一個活動室裏放着一個全新的可調節的雙槓。有次我經過，看到班裏一位

周同學在練習，做了一套漂亮的動作，我居然也有了興趣，連着幾天課後都跟着他練。但因個子小，手臂無力，加上沒有一點體育運動基礎，練了不少時間，我也只學會了跳躍上下槓和簡單的滑槓動作。其實我的確自不量力，因為我平時連體育課成績都不及格。幸而航模和收發報都列為「國防體育」，我這兩項的成績使畢業考試成績單上的體育科目由不及格提升為及格。

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前夕，開北區新建了少年宮，各個課外活動班招生。我同時報了文學創作班和美術班，結果都考上了，但活動時間在每週同一個晚上。我捨不得放棄，就每週輪流參加一班。跟了一段時間，美術班要教油畫，讓我們準備顏料。我知道家裏是買不起油畫顏料的，只能退出美術班。後來聽說，我的一幅習作入選「中國少年兒童繪畫展」至日本展覽，但我與美術的緣分至此而終。

由於專一參加文學班，我投入了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文學班請的輔導老師是新偉染綢廠廠校老師孫書年先生，他淵博的知識和精闢的見解引導我漸入佳境。大概我的求知慾望和課堂上的積極回應也得到了他的賞識，他讓我在課外去他家受教。他家在虹口區天水路一條弄堂裏，我每週或隔週晚上去一次。他家中有不少古籍，允許我借回家看。他告訴我哪些書值得看，我看《兩般秋雨庵隨筆》等書就是他推薦的。他藏有一些書畫、扇面，有時會取出教我欣賞。到我讀高中時還給我畫過一個扇面，一面是山水，另一面題着他的詩，記得最後兩句是「平生足跡半天下，寫入縱橫畫裏山」。他是無錫人，是錢基博先生的外甥，當時我還不知道錢鍾書的名字，記不得他是否提到過。我向孫先生問學一直繼續到高中畢業。

1960年五一節，開北區少年宮舉行遊園活動，請來了詩人蘆芒和一位作家，我與另一位文學班同學接待蘆芒。當時正流行寫民

歌，工農兵都能寫詩歌，報紙上登的、電臺裏播的都是這類豪言壯語，我們就此請教蘆芒，中學生如何創作革命詩歌，如何將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告別前我拿出準備好的本子請他題詞，他當場寫了新作：「六十年代第一春，技術革命巨浪滾。黨掌大舵指方向，工人階級創乾坤。」

上面的活動都是我自己主動參加的，有的還是花很大的勁爭取來的，但下面的活動就是不能不參加的政治活動，雖然我同樣非常積極主動，樂此不疲。

初一時上海開展掃盲運動，我們都攤到了任務。每天下午放學後，就到附近里弄去幫助家庭婦女識字，摘掉文盲帽子。掃盲課本是市裏統一發的，只要將上面的字都認識，讀得出來，就達到掃盲標準。我分配到的是一位住在梅園路一條弄堂裏的中年婦女、里弄幹部，她只會講蘇北話，為了方便她讀得出這些字，我也學着用蘇北口音讀。從「毛澤東主席、朱德副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開始，到日常生活用詞結束，每天讀一頁。到她們考試（抽讀幾頁）前，學校還放了幾節課，讓我們有更多時間去輔導，結果我們教的對象全部摘掉文盲帽子。

初中這三年，我幾乎沒有在上課時間以外複習過功課，甚至大部分作業也是在其他課上偷偷做好的。我在學校小有名氣，老師大多知道我，與我興趣有關的學科老師會鼓勵我學習提高，但沒有人給我提出上大學或上某大學的目標，所以沒有任何壓力。父母只求我好好讀書，聽老師話，從來不管我課外幹甚麼，只看學期結束後發來的成績報告單。畢業後我報考開北區唯一的市重點中學——市北中學，也是我自己的主意。當時，我小學同學中就有人畢業後不考初中，當了學徒。初中畢業後，有的同學進了工廠，有的考了技工學校、初級師範、會計學校、護士學校，還有人被舞蹈學校、

劇團招去了，還有的既沒有考上學校也沒有找到工作，以後去了農村農場。就是像我們這些考上高中的，也並非一定要上大學。所以無論成績好壞，只要不違反紀律，不受處分，就感覺不到有甚麼壓力。但我們這班同學的成績並不差，畢業後考上市北中學的就有七人，還有一人考上交大附中。多年後返校參加活動，或遇到已退休的老師，還經常聽到這樣的感歎：「還是你們這一屆最好！」

本文寫作於 2018 年 1 月。

永遠的母校

從我 5 歲入學到現在，50 年間沒有離開過學校——小學、中學、大學，讀書、教書、再讀書、再教書。經歷最長的是現在的學校——復旦大學，22 年；其次是工作過的古田中學，13 年；求學的浙江湖州（原吳興縣）南潯鎮潯北小學，5 年；長安中學，3 年；虬江路第一小學，1 年。很難說哪一階段最重要，因為它們都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即使是最短的那一年，也使我從小鎮上的小學生變成了上海的中學生。但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還是市北中學這 5 年。

在此期間我經歷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考驗。1962 年 5 月，正在高二下學期時，我在體檢中查出患了活動性肺結核。休學了一年半才復學，但原來的班組已畢業，只能轉入下一屆。誰知到 1964 年畢業前體檢仍不合格，喪失了報考大學的機會。我之所以沒有失去信心，能由悲觀轉為達觀，由消極轉為積極，靠的是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鼓勵。所以我在 1964 年 9 月就愉快地參加了師資培訓，決心當一名教師。以後即使在「文革」期間，在遇到極大困難時，我也能比較泰然，堅信學了知識總有用，努力工作有前途，終於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機遇。

在此期間我確定自己的努力方向，學會了自學。在初中時我的興趣很雜，幾乎樣樣都想學，都想試。體育運動雖不行，還是參加了航模、無線電收發報訓練。進高中後才懂得了要有所側重，這倒不是哪位老師專門教的，而是在那樣一個環境裏潛移默化的結果。我們班組中多數同學都有自己的興趣和追求，都在學好課程的同時發展自己的專門。我最感激的是歷史、語文、英語等老師和班主任給我的一些特殊照顧，他們並不要求我得 100 分或 5 分，而是給我自學提供方便，幫我借書，允許我使用教師閱覽室，使我在那時就讀了一部分《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名著。我高中實際只上了兩年半，病休脫的課都是靠自學補上的。此後除了上過一年英語夜校外，我沒有再接受過正規教育，但在 1978 年首批招收研究生時還能以全系最高分被復旦大學歷史系錄取，應該歸功於母校給我打下的基礎和自學習慣。

在此期間我從一名學生變為教師。從 1964 年 9 月起，我們名義上是上海教育學院師資培訓班的學員，實際上就在母校實習，我在外語教研組實習英語教師。由學生變為「準教師」的感受至今記憶猶新，教師與學生的雙重身份使自己在原來的教師和相識的高年級同學面前常常不無尷尬，加上那時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在學習與鬥爭之間往往不知所從。但這一年的培訓還是為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 1965 年 8 月——我還沒有滿 20 歲起，就正式成為中學教師，當班主任，上英語課了。35 年間，我由中學到大學，由教初中生到教博士生，由班主任到研究所所長，並曾被評為市先進教師，但我的出身始終是在母校的這一年培訓。

或許我的情況有些特殊，但每次與老同學相聚，大家都有共同的感覺，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倍感親切。

80 年代以來，我多次返校，起初是一種物是人非的感覺，母校

依舊，而自己熟悉的教師大多陸續退休，有的已經離開人世。這幾年母校舊貌變新顏，但留下的老師更少，已是物新人新了。但每當我看到市北中學這個名字，想到我在市北度過的五年，記起當年的老師同學，心中的母校絲毫沒有改變。

市北，我永遠的母校，願您永遠！

本文寫作於 2000 年 10 月 8 日，時近母校八十五周年校慶。

通古今之變的南潯

與其他江南水鄉的古鎮一樣，你可以在南潯看到典型的小橋流水人家，找到千年的古橋、百年的老屋，聽到不少在史書上提到的名字。如果說有甚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在充分領略傳統的同時，你還能品味時尚——20世紀初葉的時尚。

小蓮莊是南潯豪富「四象」（四家最大富豪的俗稱）之首劉鏞祖孫三代所建，從光緒十一年（1885年）起歷時四十年才完工，是鎮上保存最完整的私家園林。廣約十畝的池荷塘四周，環繞着長廊曲橋、亭榭樓閣，比起蘇州名園來毫不遜色。仔細觀賞，卻見飛檐斗拱、花牆漏窗連着一幢小洋房，而這種中西合璧渾然一體，天衣無縫，以至常常被遊人忽略。在江南名園中，小蓮莊的歷史並不長，卻能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顯然也考慮了這一特色。

步入毗鄰的嘉業堂，發現這座建成於1924年的磚木結構二層樓房並不是一件古董，而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最現代化的藏書樓，不僅設計和管理的觀念很新，根據藏書的特殊需要在形制上作了變通，還用上了當時最先進的建材——進口馬口鐵（俗稱洋鐵皮）和鑄鐵構件。樓主劉承幹雖以前清遺老自居，處世卻相當現實，日佔期間一方面利用「滿洲國皇帝」溥儀題字的匾額當書樓的護身

符，一方面卻已將大批珍本秘籍讓與大學；新中國成立後主動捐出財產圖書，既保全了藏書樓，也使自己能安享天年。中國近代的藏書樓中，嘉業堂是最晚建的，但一度最輝煌，歸宿最圓滿，留下的建築、設施、圖書最完整，如今也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國寶。

不遠處的懿德堂是同為「四象」之一張氏長孫張石銘的住宅，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座建於晚清的巨宅佔地 5 135 平方米，建築面積達 6 137 平方米，有大小 244 個房間，因新中國成立後長期被外貿茶葉倉庫佔用而得以完整保存。跨過一道道高門檻，穿過一進進廳堂和院落，精美的石雕、磚雕、木雕、奇石、匾額、門樓令人目不暇接。從第三進起，內廳兩側的漏明廊窗都雕刻成芭蕉狀，當年院牆旁還遍植芭蕉，是名副其實的芭蕉廳。更使人嘖嘖稱奇的是，樓窗上都鑲嵌着法國進口的菱形刻花藍晶玻璃，刻有各式花果圖案，格外高雅別緻，也顯示了張家與法國的交流淵源。

進入第四進，但見大廳地面鋪着、牆上嵌着法國進口的彩色瓷磚，是一個帶化妝室和衣帽間的豪華舞廳。在鋪着青磚的小院對面，竟是一座巴洛克風格的兩層小樓，花崗石臺階、巴洛克立柱、半圓陽臺、樓花鐵欄、克林斯鐵柱頭、百葉窗、刻花藍晶玻璃、清水紅磚牆，法式時尚和生活方式早在 20 世紀初就為張氏年輕一代所鍾愛，只是深深地掩蓋在兩棵高大的玉蘭樹下，又被四周高牆所隱藏。我幼時從牆外經過多少次，卻從來不知道這座大房子與鎮上其他宅子有甚麼不同。

出懿德堂沿河北行，有今天的南潯鎮史館。即使不看陳列的內容，這座建築本身就是南潯近代史的重要部分——建成於 1925 年的商會。南潯鎮商會成立於 1921 年，附設於絲業會館，首任會長是「八牛」（僅次於「四象」的八家富豪）之一梅氏第三代梅履中，

繼任的是「四象」之一龐氏第二代族人龐贊臣。集資 6 萬銀圓建成的商會建築，在江南集鎮同類建築中最为宏偉，今天漫步其中還能感受到這種氣派。

河東的絲業會館後被改作小學，建築雖比不上商會，但當初也有過一段輝煌。這不僅是因為南潯所產「輯里湖絲」名聞遐邇，更由於它見證了南潯絲業的外向發展和國際交流。1920 年，絲業同行組團赴美國紐約參加第一次萬國絲綢博覽會，1923 年和 1925 年分別接待了美國絲商參觀團，使輯里絲成為中國重要的出口商品和世界知名品牌。我國首次參展世界博覽會並獲獎的「榮記湖絲」，雖由廣東籍商人提供，但也產於南潯。

近年整修復原的「紅房子」是親沐西風的劉鏞第三子梯青所建。這座幾乎「全盤西化」的兩層建築能出現在近百年前，正映射出這座千年古鎮的時尚追求。幼時我在鎮上還看到過一些「洋房」，都是 20 世紀前期的產物。在我的記憶中，不僅有適園、龐家花園（宜園）、百間樓屋、土地堂、分水墩，還有與西風東漸和近代化密切相關的一些名詞——耶穌堂、洋龍會（救火會）、電燈廠、蠶種場、絲廠、育嬰堂、女子學堂等，它們都曾是當年南潯的時髦，如果能夠一一尋訪，則所見所聞正是一部江南市鎮由傳統步入現代的歷史。

鴉片戰爭後清朝被迫實行五口通商，1843 年上海開埠後，隨着新興工商業的發展，上海很快成為進出口貿易的中心，導致江南傳統手工業和商業萎縮，江南的市鎮也因此日趨衰落。太平天國戰爭造成絕大多數江南市鎮的殘破，南潯也未能倖免。但南潯的商人敏銳地認清潮流，紛紛將資本轉往上海，開店設廠，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並直接經營外貿，有的還遠渡重洋，去法國、美國經商。土絲商轉變為「絲通事」和洋行買辦，一大批南潯人成為上海的新

移民，南潯的經濟發展也與上海的興盛連接在一起。

南潯不愧有凝聚了千年的文明，趨時和西化並沒有改變它厚重的文化傳統。即使從今天的遺存也可以看出，兩者結合得相當和諧，南潯並沒有因為西式建築的出現和西風的浸潤而受到破壞，卻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特色。在南潯豪門富戶的「四象八牛七十二條蛟黃狗」中，既有巨商大賈、民國元老、黨國要人，也有名動海內的學者、書畫家、鑒賞家、收藏家，他們的後人中還產生了新中國的科學家（包括「兩彈一箭」元勳）、院士、經濟學家、詩人、作家、大學校長、部長。在聚集大量物質財富的同時，南潯一度擁有大批價值連城的古籍、書畫、金石，在全國城鎮中罕有其匹，其中一部分成為今天上海博物館的珍品和復旦大學圖書館的善本。

這就是南潯歷千年而常新的奧秘，也是南潯的魅力所在。

本文寫作於 2003 年 11 月。